



笑枫 著

玲在北大荒

· 湖北人民出版社 ·



丁玲在北大荒

郑笑枫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丁玲在北大荒

郑笑枫 著

•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湖北人民出版社蒲圻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3.375印张 8插页 8.3万字

1989年6月第1版 198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 500

ISBN 7-216-00200-1

K·35

定价：2.55元



丁玲1937年任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时，摄于抗日前线。照片旁的两句话，摘自她彻底恢复名誉后，给党中央的信文

壁上红旗飘雪浪
西风漫卷孤城
保赤人物一时新
江中开宴会
招待生客人
纤手一枝谁与似
三寸毛锥落纸
陈国同向陇山东
昨天元小姐
今日武将军

毛泽东赠丁玲词《临江仙》手迹。



丁玲在普阳农场，
同当年并肩劳动的乡亲
交谈。

丁玲在汤原农场，
喜看丰收景象。



丁玲夫妇（左三为陈明）在北
大荒寻找他们当年蹲过的“牛棚”
旧址。



丁玲和当年一起做家属工作的胡冬莲扯家常。



在宝泉岭重逢曾同住一个“牛棚”的谢桂琴。

► 丁玲和当年养鸡排的姑娘们合影。左起为：李炳兰、丁玲、丛凤之、王俊芬。



▼ 丁玲重访北大荒时，在宝泉岭农场和当年六委的家属们参观新居。





▲ 1981年11月，丁玲夫妇到《续西行漫记》的作者尼姆·威尔斯的家中作客。

◀ 复出的丁玲，出席1979年文代会。她在这张照片旁亲笔题字。



1981年11月，丁玲在纽约与美国和台湾作家合影。



丁玲和冯雪峰的孙子。



丁玲和她的小外孙。



1987年3月，研究丁玲作品的专家、教授在丁玲家中共商“丁玲作品讨论会”的筹备工作。右起第一人为本书作者。



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
玲在北京协和医院。这是她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丁



丁玲八十寿辰，与陈明在寓所中合影。



“有许多人，甚至外国朋友们
都问我：这二十多年是怎么熬过来
的？……我只能说，我有信念。”

丁玲：《讲一点心里话》

序

魏巍

《丁玲在北大荒》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感到由衷的高兴。我想，延安时期与丁玲并肩战斗过的老文艺战士看到这本书，也一定会和我一样，感到高兴和欣慰的。

丁玲在北大荒的情况，一般人所知不详。过去，我怕触及她的伤痛，也没有多问过她，并且一直想当然地认为她是被发配到北大荒的。后来我才得知，是她主动要求去的。笑枫同志撰写的这本书中又告诉我们：1963年，也就是丁玲在北大荒度过五年的艰苦生活之后，作协党组和中宣部的负责人曾想让她回来，并且说可以发调令，但她却表示，愿意继续留在北大荒。丁玲到北大荒，无疑是她一生中的大事。我认为，她的这个决定很不一般，在身处逆境的情况下，没有非凡的勇气，是不可能采取这个行动的。而这个勇气则来源于她对党的信念和一贯的文艺思想：革命作家必须与群众相结合。丁玲当时认为，她住在北京的小四合院中，固然可以苟安一时，但被划了“右派”，没有人敢接近自己，这样就会形成与人民群众的隔离，而这是她所不能忍受的。她对自己说：“不必犹豫了。不要留恋这死寂的庭院，到暴风雨中，到人群里面去，到火热的劳动中去。”“沉在人民中去，和人民在一起，总有一天能和人民一样光明磊落地生活。”这就是她当时的想法。

自然，丁玲这次下去，和过去深入生活有很大的不同：第一，她到北大荒那年54岁，已经年老体弱了；第二，用丁玲的话说，这次是象林冲一样脸上“刺了字”的。丁玲说：“过去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作家，是一个靠近中央靠近首长的上层人物，我下

7-105/02

去时，一层一层的大小干部总要欢迎我，请我讲话，问我要什么材料，向我汇报。我的劳动也很简单，无非是做做样子，既不出一身汗，也没有满身病痛。那时人们对我鼓掌、含笑，围着我的汽车，看大作家下来生活。1957年下去就不一样了，头上有一顶很大的‘右派’帽子，因此，人们虽然同样围着看我，却象是看猴戏一样，只是觉得新鲜奇怪罢了。”只要意识到这种天壤之别，我们就会想到，她面临的这场考验是多么严峻，她面前的历程是多么艰辛！

然而，在这场长达20年的考验中，丁玲终于走过来了，而且是作为胜利者走过来的。尽管这个胜利不免伴着痛苦和眼泪。

“我要在几乎没有任何光明的处境里开阔出一条光明的路来”，丁玲曾这样鼓励自己，她完全做到了这一点，以一个勇士的姿态做到了这一点。

这二十年，丁玲是怎样熬过来的，为什么能够熬过来呢？归根结底是她有信念。她始终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她认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经得起委屈的考验”。“谁一见我都说这是个大右派、大叛徒。但我在内心始终认为自己还是个共产党员，我要以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她还说，“在那动乱的日子里，我是饱经磨难。好心人对我说，你死了吧，这日子怎么过？我回答：什么日子我都能过。我是共产党员，我对党不失去希望。我会回来的，党一定会向我伸手的。海枯石烂，希望的火花，永远不灭。”我确信，丁玲正是依靠这坚强的信念才冲破一道道险关的。

我第一次看到丁玲同志，是1938年在延安。那时我在抗大学习，才18岁，正是人们说的“红小鬼”。因为喜欢诗歌，我经常到柯仲平同志那里去，就在那里见到过丁玲，但丁玲同志并不认识我。日本投降后，丁玲同志来到晋察冀，我也只在一位朋友那里遇到过她。直到解放以后，我才与她有些接触。她的作品，

我以前断断续续地读过一些，但那时年轻，理解得很粗浅。因此，虽然丁玲同志一向热情地鼓励我，但我却对她缺乏真正深刻的理解。加上年轻，脑子简单，这样，我也参加过作家协会批判她的集会，也做过错误的发言。现在回想起来十分抱歉。但是，1957年把她打成“右派”，我在内心中是有怀疑的。因为1955年她已经作为“反党分子”被打倒了，1957年的大鸣大放，她根本没有参加，没有任何言论，这时的批判，只是把老问题又拿出来升了一下级而已。我记得，那时丁玲同志一开始就有不祥的预感，她曾在会上说，我怕把我打成“右派”。结果还真的把她打成了“右派”。以后这颗怀疑的种子在我心里越长越大，老是困扰着我，我曾私下多次问其他同志：“你认为丁玲是反党吗？她什么地方反党呢？”经二十多年，这桩冤案才算结束了，丁玲同志又站到我们面前来了。当我听到她所受的种种磨难，真是万分痛心，肝胆俱裂！但也正是在这样严酷、这样漫长的考验中，使我重新认识了丁玲同志。老实说，如果思想不很坚强，象这样严重的磨难，是会令人怨愤的，是会令人心灰意冷的，是会令人悲观失望甚至信心动摇的，然而，我们的丁玲同志，不单对冤毫无怨恨之心，而是更加坚定了对党的信念，在政治上更加成熟了，也更加热情奋发了。当她回到党的队伍时，她曾经在文章中热情地喊道：“党啊，母亲，我回来了！”我在第四次文代会上听到她的第一句话，也是“我感谢党！”我可以说，丁玲同志对党的耿耿忠心，她的共产党人的胸怀和风范，强烈地感动了我。从她的言论行动使我进一步认识到：丁玲同志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一个从三十年代以来的血泪与风雨中走过来的真正的无产阶级作家！从丁玲复出到她逝世的几年间，不论在国内或国外，她的全部言行都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这正是丁玲的伟大之处。她决不会象某些人，把永远难以平复的怨恨带入作品中，讽刺，挖苦，谩骂，不仅使自己失去正确的立场，而且影响读者准确地、

全面地理解我们人民共和国的现实。

丁玲作为共产党员作家的另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她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笑枫同志经过实地调查，生动地再现出丁玲在北大荒的生活情景，充分体现了她的高尚品质。丁玲同志毕竟是老干部、老党员，她既有深入群众的决心，也有接近群众的本事。她不管头上戴着什么帽子，一到北大荒就立即以党员的姿态出现。介绍信没有写要她参加劳动，她硬是要参加劳动；领导要她去条件好些的地方，她硬是要到条件最差的地方去披荆斩棘；她关心青年的健康成长，经常与不安心北大荒生活的青年促膝恳谈；她关心群众的疾苦，帮女工办起了托儿所；……在漫长的日子里，丁玲与北大荒人血肉般地连在一起了。丁玲复出时，正是当年丁玲亲自教他们认字的“文盲”们给她寄来了第一封祝贺的电报；丁玲逝世时身上盖的那面红旗，也是北大荒的群众敬献的。

丁玲逝世后，她的生平简介中说：“在新文学的几个转折时期她的创作都体现了党所倡导的文学发展的方向。”我还想说，丁玲的党性，她对党、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她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共产党员作家的典范！

人间的风雪呵，风雪的人间！正是在北大荒无边的风雪中，我望见了一个不朽的共产党员作家的崇高形象！

1987.6.4.于北京

我坐上北上的列车，去北大荒探访丁玲生前在这里生活、劳动的事迹。我沉思地紧靠在急速奔驰的列车车窗前，从车窗窗口向外望去，在一望无边的辽阔黑土大地上，我仿佛看到印着一条很深很深的脚印，这条脚印，从严寒的风雪荒原，一直通向北大荒人温暖的心间，在身处逆境的艰难坎坷岁月之中，这位曾是勇于呼唤新的觉醒与追求的中国文坛上左翼文学的战将，以一个共产党人的坚贞信念和非凡的毅力，和北大荒人同欢乐，共艰苦，扎根风雪荒原12年，从人民中赢得了理解、信赖和敬仰。从桑干河到北大荒，从深深地印在北国边陲这片辽阔的黑土大地上的脚印，我仿佛听到一个革命作家坚贞不渝地走在人民中间的坚实的脚步声……

动身去北大荒前，我在陈明家待了整整两天。陈明心情沉重地回顾着往事时，我感受到：他的那颗失去亲人的心，仍在微微地抖动。从他的回忆中，我得知了丁玲去北大荒之前的一些情况。

丁玲蒙受天大的不白之冤。陈明首当其冲成了右派，发配到北大荒。他们的党籍都被开除了，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心，却是任何人不能拿走的。丁玲说：“我要做出自己的证明，到群众中去找回真理，扫除迷茫，继续用自己的言行，谱写为人民的人生”。

全国解放后，丁玲本来决定留在东北从事写作，她感到解放战争已经胜利，要写的东西太多了。但革命工作需要她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决定；来到北京，致力于新中国的文艺领导工作和编辑工作。1950年到1954年期间，她历任中宣部文艺处长、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中国作协副主席和《文艺报》、《人民文学》的主编。1955年一阵政治上的狂风暴雨突然降临到她的头上。年底，她被无端地打成“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黑头目之一。

“这年年底，哪一天我记不清了。”陈明回忆说：“我接到通知，去听传达中央文件。会议开了三天，谈的都是丁玲的问题。文件列举丁玲的头一个大问题，就是曾经自首变节，这是指被特务秘密逮捕，关押在南京的那一段历史；第二个大问题，列举了全国解放她到北京工作后的四大罪状。我一听，全都不是事实。”

陈明感到迷茫：在前些时候的一些会议上，有人提出了“丁陈反党集团”的问题。这些会，丁玲参加了，她是知道的。她光明磊落，相信党会澄清事实，从未想到会被无端地给戴上这顶大帽子。她一点也不知道，完全被蒙在鼓里。

陈明感到迷茫：对人的处理，尤其要慎重，这是党历来的传